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孕育纳粹式疯狂的“德国因素”



### 尽管排犹是欧洲性事件,但只有纳粹德国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犹主义,甚至到赶尽杀绝的地步。

有着“黝黑的面孔、鹰钩鼻、鬈曲的头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冷血无情的夏洛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无形中犹太人拥有了各种莫须有的“反派”形象。

作为欧洲的一员,当时德国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可以想见。尽管是欧洲性事件,但只有德国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犹主义,甚至到赶尽杀绝的地步。首先是十九世纪生物种族主义的登场亮相,犹太人被指为“劣等民族”。也正因此,一战失败大大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排犹情绪。1918年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此时纳粹的宣传机构更是宣称,犹太人是“德国社会机体里的脓疮(戈培尔语)”。犹太人的悲剧命运终于来临。

### “大屠杀”的德国因素

在费舍尔看来,排犹并不绝对导致那场令人伤痛的大屠杀。他将德国特有的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费舍尔表示,也不能忽视“德国因素”才会孕育出纳粹式的疯狂。

“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宏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说出过这样的昏话——“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

知识界的反犹是对德国传统的继承,也与现代主义的流布有关。20世纪20年代,许多德国犹太人成了现代派的先锋,创造并发展了许多至今仍不过时的思想观念与表达模式,如心理分析、社会学、表现主义、无调性音乐、存在主义哲学和量子理论等,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犹太代表,如弗洛伊德、麦克斯·霍克海默尔等。然而,那些自称“德国文化特性”继承者的思想家打着维护“古典传统”的幌子,极力排斥先锋派运动与现代文化。

知识界的反犹蔓延到教育。在纳粹德国的学校里,教唆学生去憎恨犹太人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德国大学的前沿机构和学科甚至还开设了种族卫生学和种族医学等课程。

而此时,纳粹的高层人物

### 人类的反思永不停止



2004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蒂芬·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体回忆录,回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秩序井然、从容淡定的生活,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失去理智的极端行为,战后道德与价值观的倒退与混乱。



2016年12月 译林出版社 郑洪 《南京不哭》

继张纯如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终身教授、世界知名物理学家郑洪再书国殇,全书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真实经历改编。



2013年9月 中信出版社 张纯如 《南京大屠杀》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收集大量第三方资料,并前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大屠杀幸存者进行面对面的取证交谈,前后历经三年时间写就此书,使这段“被遗忘了的大屠杀”的历史为世人所知。



2008年6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

表现出病态的反犹狂热,并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号召民众消灭犹太人。奥斯维辛上空的青烟就此冉冉升起。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视这一大屠杀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阿伦特以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但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费舍尔觉得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这场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操控它们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

### 犹太人为何坐以待毙

对于犹太人的遭遇,费舍尔充满同情,但也不无从犹太人本身发出的思考。犹太人为何坐以待毙?以这个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智慧,为何没有提前察觉和远离苦难的到来?

费舍尔从两个方面解读了这种奇特现象。首先是犹太人对德国心存幻想。他们依然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对德国怀着美好的期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共存的可能性。他们说,“除了德国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我们只是借着我们的信仰才成为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层面,我们都属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犹太人领袖的误导。纳粹势力兴起之时,德国犹太社会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凝聚力。一些保守的犹太领袖也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纳粹主义的危险性。成立于1921年的“德国犹太人联合会”是德国犹太人的主要保护性组织之一,该组织的创始人马克斯·诺伊曼号召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和其他德国人一样忠心爱国,“做百分之百的德国人”。

政治上的淡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大多数德国的犹太人错误估计了形势,直到苦难降临的那一刻,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意识才觉醒——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但此时,他们已无所归依,正如茨威格的那部名作所描述的那样,那个曾经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已经远去。

12·13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临近。这再次提醒我们,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苦难。

苦难不仅仅应当被铭记,更值得永不停止地反思。在对“大屠杀”的反思上,德裔美籍历史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要比很多人走得远一些。他研究与反思的是同为二战时期另一段全人类的伤痛记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暴行。

在继《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之后,费舍尔又推出了《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翻看后者的过程是场异乎寻常的体验,无论惊心动魄还是悲伤愤怒,都无以形容。正如作者费舍尔所言,这的确是个“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系统地追溯了自中世纪以来德国社会中的反犹现象及反犹活动,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部论述大屠杀的专门著作,但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大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一种“平庸的恶”,还有整个欧洲的排犹情绪、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和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

无论如何,人类从铭记中获得力量,从反思中获得经验,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前行。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 从排斥、恐惧到屠杀

1871年,一位犹太裔的普鲁士国家下议院议员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地位时,如释重负地评论说:“经过多年无望的苦苦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了安全的海港。”历史的吊诡在于,他无法预料到数十年之后的德国所发生的苦难。“大屠杀后再对其进行回望和观察,这个事件在历史评价方面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费舍尔的话里满含叹息。

与费舍尔的第一本书还略侧重于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的兴起到毁灭史不同,《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则尝试进一步揭示一些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这样的邪恶是如何在许多被认为是进步的西方突然爆发出来的?给世界提供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作家的德国人,为什么屈服于一种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预言出现的兽性?

费舍尔的历史梳理从早期欧洲的排犹史讲起,直到纳粹德国病态恐犹主义的兴起和晚期的血腥大屠杀,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德国反犹历史的基本脉络。

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在民间,人们一度制造出各种犹太人的传言,如犹太人跟魔鬼结盟,犹太人拥有世界阴谋,犹太人是阴险的高利贷者。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他们